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主 编 李定开

副主编 吴洪成

重庆教育史

第三卷

本卷主编 唐智松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重庆教育史

第三卷

主 编 李定开

副主编 吴洪成

本卷主编 唐智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教育史/李定开主编 吴洪成副主编.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5621-3418-9

I. 重... II. ①李... ②吴... III. 教育史
—重庆市 IV. G527. 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753 号

.....

重庆教育史

主 编 李定开
副 主 编 吴洪成

责任编辑:弓关木

封面设计:谭 玺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 邮编 400715)

(网址: www.xscbs.com)

印 刷 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6.5

字 数:1424 千字

版 次:200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21-3418-9/G·2144

定 价:140.00 元(共三卷)

《重庆教育史》序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重庆教育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改百年

在这乙酉金秋时节，秋风送爽的日子里，《重庆教育史》问世了。这是重庆教育界的一件盛事，它是重庆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史。它把从巴子国至 2000 年，重庆直辖市范围内基本的教育史实、教育思想重现在全市人民面前，让广大教育工作者，温故知新，借鉴历史，以推动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

《重庆教育史》体系完整，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从巴国发轫，到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的重庆教育，均有系统的载述，并揭示了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至于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教育，更是浓墨重彩，充分展现出战时重庆教育的繁盛蓬勃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教育，在曲折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重庆实施“科教兴渝”战略，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发展迅速，成效显著，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重庆教育史》资料翔实。它主要取材于重庆教育志办公室组织搜集的大批资料和重庆市所属 40 余个区县的区县志和区县教育志。对各区县从古到今的教育活动、教育制度、教学情况都有反映。该书撰写了古代各区县官学、私学、书院、科举和教育人物；对近现代西方新教育的传人，重庆各区县新式学堂的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肇始，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各种教育实验的开展，各级教师对教育的奉献均有述评；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重庆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在不断探索发展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更多翔实生动的记载。在史料方面多有新的发掘。

《重庆教育史》总结了历史上的教育经验,有益于当今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在宋代有张载到合川、程颐到涪陵办书院的经验,在清末有张森楷在合川办实业教育的经验,在民国前期有吴芳吉办江津中学的经验,有张伯苓办重庆南开中学的经验,有陶行知办育才学校的经验,有周勛成办巴蜀学校的经验,有杨若愚办树人学校的经验,有傅仁敢办清华中学的经验,有晏阳初办华西教育实验区的经验,有卢作孚办民众教育的经验等等。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县各级各类学校都积累了很多办学经验。

毛泽东同志曾十分精辟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重庆教育史》对重庆3 000年的教育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生动的描绘。

希望全市各级教委(局),应认真组织广大教育行政干部、广大教师、大专院校的学生学习《重庆教育史》,这必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2005年9月

《重庆教育史》导言

《重庆教育史》记述了重庆 1997 年直辖后,直辖市范围内 40 余区县从远古到公元 2000 年,在各朝各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思想,并揭示它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构建了从古到今的完整教育发展体系,全面、具体地展现了重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利弊得失,并揭示了教育的历史本质,分析了历史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作出了价值的判断。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地方特色突出,基本做到了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具体言之,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书的体例采用了断代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恰当地划分了重庆教育发展阶段和情况。全书基本上以朝代为根据分段,但又按照资料的多寡有一个朝代为一阶段者,也有几个朝代为一段者。如第一卷第二章,包含了两汉魏晋隋唐几个朝代,第三章至第四章基本上是以一个朝代为一阶段,第五章至第八章把清代分为前中期和清末两个时段,用四章的篇幅记述之。每一章中又按官学、私学、书院、科举、教育人物等专题而具体记述。第二卷亦然。第三卷前四章分段记述,后四章在一个段中分专题论述。在分卷上未按古代、近代、现代来划分,而是按资料的多少,把从原始社会到清代末年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一卷,把民国时期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二卷,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三卷。如此,使三卷能基本平衡,在分量上相差不太远。从重庆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一卷展示了古代巴族文化与重庆教育的发生和发展,第一卷末和第二卷展示出重庆新教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

三卷展示出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学校教育的接收、改造、建设、发展的曲折过程。

第二,全书的内容突出了重点。第一卷,清代的重庆教育比较发达,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进行详述,从文字的分量上看,此四章占全卷的一半以上。第二卷突出了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全卷共十一章,抗战阶段的重庆教育占了六章,从文字的分量上看,此六章占全卷的一半多。第三卷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教育,且按专题将此时段分为四章进行撰著,从篇幅的分量上看,占全卷的一半还强。

第三,体现了地方特色,做到了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来安排章节,并突出了本地区对全国教育的贡献。如重庆的原始先民为“巫山人”,后改称巴族,第一卷便从巴文化入手,揭示了重庆文化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后来,重庆的居民以汉族为主,还包括土家族和苗族,全书便以大量的篇幅写汉族教育,同时也安排了相应的章节来撰著土家族和苗族的教育。抗战时期衣冠西渡,全国不少教育家来到重庆,大搞教育实验,努力进行教育教学,为重庆教育贡献了力量。第二卷的教育人物中便用专节介绍了黄炎培、张伯苓、傅任敢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第八章第二节撰述河南籍教育家邵爽秋的民生教育实验;在第十章第三节,专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西实验区的教育实验;在第五章第一节中用一个问题来记述“战区中小学教师的安排——第三服务团”。另外,抗战期间,战区流亡学生纷至沓来,为了反映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学生的安排,在第五章第一节里还专题撰写了“收容战区学生”。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战区各级学校迁渝,使重庆的各级学校教育发展到极盛,真可谓“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教育的中心。战区学校的迁渝,使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土地上,同时,这块沃土“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特别是迁渝的好些高等学校,来时规模较小,

复原时规模扩大了若干倍,浩浩荡荡地迁回战前原址,第二卷用了不少笔墨来撰写之。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武斗特别严重,破坏性很大,给教育带来了严重恶果,第三卷第三章试图反映这一基本情况。1987年至1997年,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在合川开展“生活教育”整体改革实验,历时10年之久。为反映这一实验情况及其效果,第三卷第八章第六节专题撰写了“合川陶行知创造教育实验”。总之,这部书基本上反映出重庆教育历史的地方特色。

第四,该书对重庆历史上的教育资料有不少发掘,这是对重庆教育乃至对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从第一卷的前半部分不难看出,作者翻阅了大量的上古时期的有关历史资料,参考了三峡考古的新发现,基本弄清了重庆人的来龙去脉和巴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为重庆古代教育理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同时,有新的发现。第一卷后半段的清代重庆教育资料特别多,是因作者查阅了清代重庆40余区县的县志,才使清代重庆的教育内容较详细地得以展现。第二卷和第三卷扩充了原四川省的万县地区、涪陵地区和黔江地区的相关内容。把各区县县志和教育志中发掘的新资料都纳入了这两卷的内容。在这两卷中,重庆市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革命活动、教育改革都得到了展示,教育、教学经验得到了总结,这显然是查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校史,从中发掘了不少资料。在教育人物方面,第一、二、三卷都有新的发现,如荣庆是重庆出生的教育人物,白屋诗人、教育家吴芳吉,真正的师表——唐以荣等,并使这些新发撰的教育人物的教育思想得到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

第五,该书注意了史论结合,不但叙述历史,而且也有评论,在评论中有抑有扬。第一卷对每一时期的教育状况和教育人物都进行了概括提高,某些章节还进行了专题评论。第二卷对每一章的教育事实,都专门安排了对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探索一节,一方面概括提高,另一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说。第三卷各章都安排一节

评析当时教育发展中的成绩和问题,并对成绩加以颂扬,对问题提出对策,基本上做到了抑扬结合。

第六,该书在撰写过程中注意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国史和地方史的关系,该书总是以中国教育史为纲,统帅重庆教育史;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重庆市一般都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定。但也有不完全按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办理的,如北碚三峡实验区的卢作孚。他在区内中小学实行的有独到之处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举措,有其特别之处。二是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关系,现在重庆所管辖的范围,原是四川省在川东的三区(或四区)一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抗战时期重庆市区除外)和重庆直辖之前都属四川省政府管辖,因此,在教育方面除贯彻中央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外,还要贯彻四川省政府的批示和决定,表明是四川省的一个部分。

第七,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用对比的手法,即把重庆地区和全国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相对比;把重庆市和成都市相对比;把重庆市各区县和四川省各区县相对比;把重庆市范围内各区县相对比。并在对比中加以量化和分析,得出重庆市在全国、在西南、在四川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地位,以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地位变化。

从以上特点可知,《重庆教育史》是一部教育的历史书籍。中国近代教育家杨贤江说:“教育史便是以叙述教育事实及思想(即所谓实际及理论)之变迁发达为目的者。故凡称为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详为记载,再要对于教育的思想学说即所谓理论者,广为记录,或更加以评论。”《重庆教育史》正是这样地记载了重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实际)、教育思想(理论)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各阶段的教育事实和思想进行评论分析,以达到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经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目

的。要求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做到有论有史,史论结合。正因为如此,它和教育志书不同。志者记也,文字记录之意。志书,为记录的书籍。所以,《重庆教育志》虽然中正地记录了重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人物的活动,但不加评论分析,在写作过程中采用记述文体。这就是《重庆教育史》和《重庆教育志》的区别,也就是为什么有了《重庆教育志》还要写《重庆教育史》的原因。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育才学院 李定开
2005年8月

自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及解放战争期间的巨大破坏,使得在国民时期获得巨大发展的重庆教育急剧下滑。新中国前夜的重庆教育在遭受百般破坏之后,满目疮痍。1949年底,重庆解放;1983年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1997年,重庆直辖。由此渐次揭开了新中国重庆教育发展史的崭新一页。

1949年11月,重庆获得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揭开了新中国重庆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局面。解放之始,市军管会就接管了原重庆市教育局,改为市文教委员会,开始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事业的建设。主要通过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各级学校的接管、整顿,建立起了正常的社会主义的学校教学秩序;通过颁布“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方针,促进了普通中小学、中专和高校的大发展和职工余学校、农民业余教育、机关干部文化学校的蓬勃开展;同时鼓动大规模的苏联教育经验学习热潮,促进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庆文化教育体系基本由此而建立起来。重庆各级各类教育在此期间也相继得以恢复、发展起来,如完成了对幼儿园、小学、私塾、普通中学、各类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接管和整顿,使之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的社会主义学校。同时,通过各级各类教育向工农及其子弟开门,优待工农入学,举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大力开展工农群众业余教育等途径,拓展教育时空,密切教育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充分发挥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作用。虽然此期的重庆教育存在由于起步阶段的自身幼稚所带来的特征和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等问题,但此期对旧教育的顺利接管、有效整顿和成功改造,奠定了后来重庆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是功不可没的。

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发布掀开了人跃进和调整巩固时期的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五反”、“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序幕。在此特殊政治条件下的重庆教育仍然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进。从1958~1960年,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重庆市提出了加快教育发展速度、尽快改变教育落后面貌的全面跃进的雄心壮志:普及初级中学教育、扫除文盲、实行半工半读学校要达到90%,力争教育质量要赶上北京、上海;并且提出了中小学和高等院校跃进、赶超的具体目标。同时,此期的重庆教育多有改革之举,包括推进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改革中小学课堂教学、减轻学生负担,改革师范教育等,实践全日制与半工半读的两种教育制度等。当然,此期不符合规律的“教育跃进”虽有一定成效,但其负作用十分明显,因而于1961~1963年的教育事业整顿就成应属之举。1961年,重庆市教育在认真总结过去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继续把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调整得更加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着重把调整保留下来的全日制学校切实办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包括根据教育部要求大量裁并条件差且布局不合理以及重复设置的中等专业学校、压缩全日制中小学规模和调整学校布局、认真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等。通过大跃进与整顿的重庆教育,虽然存在政治冲击正常教育、教育发展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教学改革违背规律等问题,但是在办学形式多样化、教

育结构完善、扫盲教育开展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还是有成效的。

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包括重庆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深重灾难。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个短暂的教育领域局部整顿，但一直占主流影响的却是极度混乱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各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教育在红卫兵运动和造反夺权与武斗构成的初期大混乱、中期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斗批改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后期的局部整顿等几个阶段中时存时亡。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两年，从“破四旧”到大串联，从造反夺权到派性之间武斗，就把重庆教育推向全面瘫痪境地。中央于1968年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促成了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开始，一度混乱的学校教育暂时进入了相对“稳定、有序”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教育“革命”的结束，而是坚持把学校教师和领导当作革命的对象，实施工人阶级“外行领导内行”的学校教育体制，散布“知识有害论”和“读书无用论”等论调，使得传递人类文明的教育几近废绝。与此同时，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被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接受“再教育”的现象，又演绎出了现代社会先进知识青年放弃知识劳动从事体力劳动的闹剧，它所造成的连续正规学校教育的废弛而耽误了年轻一代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大学停招而少为国家培养了上百万高级人才导致当时的人才断层，拉大了我国与当时正处于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从而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诸多方面的灾难不可胜数。教育领域在1971年前后经历的由“批、斗、改”构成的“大变革”，使得已经饱受摧残的教育事业再一次蒙受了更为深重的磨难。因此，反思“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开门办学，频繁地下乡劳动，学工、学农、学军、学商，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等事

件的社会历史原因,避免类似错误发生,也不是没有意义。

1976年,拨开乌云见太阳的中国人民,开始新的生活。重庆教育界开展了积极的拨乱反正活动。先是从1976~1978年间开展的揭批“四人帮”歪曲篡改教育方针和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教育的罪行,各级学校重视贯彻执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调整、充实学校领导班子,工宣队撤离学校,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恢复了包括招生考试等规章制度。肃清了流毒,统一了思想,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蒙冤者得以平反昭雪,正常教育秩序恢复,考试制度重订。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仍未纠正、阶级斗争为纲尚未抛弃,由此影响拨乱反正初期教育工作纠偏的成效。1978~1985年期间,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上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开始重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教育经验,依靠日益强大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使得小学教育基本普及,中等教育结构趋于合理,职业技术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师范教育得到有效调整改革,教师继续教育得到保障,高等教育在不断调整中完善提高。

如果说拨乱反正时期的重庆教育仅仅就是一个拨乱反正而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量”的积累的话,那么,基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支撑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岁月中长足挺进的重庆教育则是“质”的提高。由此宣告改革开放以来重庆新教育篇章的揭幕。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有力地推进了重庆“普九”教育工作,加之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颁布、贯彻,到20世纪底,重庆市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达99%以上,有力地促进了重庆市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颁布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颁布于1994年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于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规有力地促进了重庆市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大发展。1997年,重庆直辖,涪陵、万县、黔江三地划入重庆版图,为重庆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此,重庆市教委设计通过选择“全方位、大体系、高效益”的发展走向,实施“两步战略”,完成“四大任务”,达到“三大目标”的跨世纪重庆教育发展思路,来达到:基本建立起由坚实的基础教育、完备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达的高等教育组成的教育体系,各类专门人才基本满足重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市民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质量在西部地区居领先地位,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初步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中心等目的。为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提出了确保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农村教育、三峡库区教育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大力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水平;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大力提高城乡劳动者的素质;加强教育同科技、经济的结合,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学校建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示范之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五大任务。纵观改革开放期间重庆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可以感受到此战略部署对于大力普及与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和质量、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与质量提高、促进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并进、推动教育移民和民族教育等各项工作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

总之,到2000年截止,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七五”、“八五”和“九五”3个发展阶段的重庆教育,虽然经历了1989年那样短暂而严重的政治风波、学潮运动,但从总体上表现出强大的发展势头,表现在无论是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学校系统教育,还是包括党政干部教育、职工技能培训、工农业余熏陶

的非学校系统教育,都获得了规模上的巨大发展与质量上的重大提高;无论是教育教学领域工作,还是科学研究工作,也都获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还是汉族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也都获得了蓬勃发展;无论是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微观的课程教学、招生考试改革,都在改革中奋起前进。

基于上述关于新中国的重庆教育发展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历史阶段,我们可将此期的重庆教育发展划分为军事管制时期的重庆教育、大跃进和调整巩固阶段的重庆教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教育、拨乱反正时期的重庆教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科研)。

研讨上述几个时期的重庆教育,其内容包含两大单元。第一单元即为改革开放以前的重庆教育发展史,分4章,包括:第一章,军事管制时期的重庆教育;第二章,大跃进和调整巩固阶段的重庆教育;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教育;第四章,拨乱反正阶段的重庆教育。分此4章,旨在力图反映建国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重庆教育在艰难曲折中的发展历程,揭示在全国大背景下的地方教育所具有的共同性问题。第二单元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教育发展史,分4章,包括: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初等教育;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中等教育;第七章,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高等教育;第八章,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其他各类教育与科研。分此4章,旨在力图较为详细地记叙、阐发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各级各类教育 and 教育科学研究、教育官员与人物的情况,审视改革开放以来重庆教育发展的工作历程、获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上述划分中,后4章作为对一个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详细,一则反映此期教育发达的事实,二则反映作者厚今薄古、以发展眼光对待重庆教育发展史实的观点。

本卷各章节撰写分工如次:自序:唐智松;第一章:彭泽平、姚

琳、李定开；第二章：周玲（第一、二、三、四、五、六节）、李定开（第七节）；第三章：蒋述东（第一、二、三、四、五节）、彭江、郑红岩（第六节）；第四章：李跃文、李定开；第五章：唐智松、李珊译；第六章：张学敏、辛治洋、支太和；第七章：唐智松；第八章：杨挺、余莹孺。本卷由唐智松、李定开负责审读、统稿。

在本卷编撰中，我们参考了重庆市政府和市教委历年来的相关文件、总结，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编写的《重庆市教育志》；重庆市各高等院校的校史和工作总结；重庆市有关区县的教育志和历年工作总结；有关重庆市中小学校史、报道材料等。编撰中，多有引用之处。这些丰富的资料为我们编撰《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教育》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对此，本卷全体成员致以诚挚谢意！同时，须加说明的是，本卷书稿完成于2000年底，故书中所引资料，所及时间均截至于此，既然文献引用截止较早，而出版又推至于今，其中的述评境界当请见谅！在查阅重庆市教委机关文献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彭智勇、教育志办主任孙文松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